

关于韩国近代主体的研究

——以自强运动时期的申采浩和朴殷植为中心

朴正心

中文提要：面对强有力的他者——西方的时候，我们只会内在的反复发问“我究竟是谁”。面对异质文化的西方近代，朴殷植和申采浩都主张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同时也要对儒教传统进行批判性继承，以此来确立韩国的近代主体地位。与西方视理性的个人为主体不同，朴殷植和申采浩提出了新国民作为韩国的近代主体。他们认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是保全个人生存之路，因此对于市民社会的主体——个人没有赋予强有力的意义。他们认为新国民的集团觉醒是恢复国权和实现独立的优先要务。他们提出的新国民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国家民族的成员，具有强有力的集团意识，还要实现良知、新道德等道德的觉醒和实践。另外，朴殷植的道德良知以及申采浩的固有朝鲜的主体性都与儒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朴殷植关注良知学以及申采浩肯定儒教扩张论都是从近代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诠释和改革儒教的新尝试。他们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和继承来确保了朝鲜的主体性，并提出只有不丧失主体性才能够实现主体的文明化和独立。因此他们既批判儒教又继承儒教的做法并不矛盾，而是近代朝鲜的主体对应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来实现自我成熟的过程。

关键词：近代性，近代儒学，良知学，我（主体），新国民

一、序论

西方近代通过自生的动力而形成了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是，西方近代的发展也是外向的膨胀性的榨取。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不仅仅是政治、军事、经济性的压迫和掠夺，同时也造成了将白人神化，即“西方=文明，非西方=野蛮”的两分法和“世界文明西方化”的现象。而韩国的近代化是通过对强大的西方近代化的理解、吸收和批判来实现的。因此，在谈论韩国近代思想时，不能排除西方的近代化。但是，韩国跟西方在文化、历史的传统和经历上有所不同，应该充分考虑这个差异性。所以，如果单纯使用西方近代化的普遍基准来衡量韩国的近代化，则很难体现“韩国近代化”的真面目。韩国近代思想是在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多种多样的光环中形成的，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它与西方发展的方向不同。

在前近代社会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近代社会有必要确立一个能够推动近代社会的近代性主体。西方通过启蒙运动来发现个人，从而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发展。而韩国的近代则交杂着文明史的转换期，是性理学的解体和对西方文明的吸收这两个变化。但是韩国也面临着吸收西方文明之文明性的同时也应该抵抗其野蛮的帝国主义侵略性这样一个中间问题。所以，在 20 世纪初叶的自强运动期间，韩国一方面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模式，同时也需要克服“帝国主义侵略性”。批判性的继承儒学思想在再次树立韩国正体性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面临着亡国危机，故韩国树立近代性主体并解决中间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韩国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不同，所以韩国近代性主体也就不可能与西方一致了。笔者在此将通过自强运动期代表性的思想家申采浩、朴殷植的论述来考察韩国近代主体的哲学性探索。

二、近代主体的双重含义

（一）西方近代主体：理性的个人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近代空间中最重要哲学问题就是确立近代主体。在西方，从笛卡尔的“思考的自我（我思，故我在）”开始，象征着拥有理性的自律性的个人成为近代主体。个人之所以能够作为主体出现，是因为相信人类能够规定并约束自我并根据以理性为基础的规则来行动为前提的。近代人们普遍以理性为依据进行思考和自我约束，并拥有不可让步的权利，从而使得个人成为“世界的中心”。理性之人成为世界的中心意味着中世纪的神丧失了地位，而主观性（subjectivity）则被赋予了神的地位。主体（subject）或者说自我(self)开始上升为近代的核心存在。人的生活不再受宗教真理或传统的规定，而是依据理性认识的真理来进行界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的近代性是在神所消失的地方创造了一个新的神的中心。

西方近代的理性可以概括为从咒术性的、神化性的世界观以及传统和神的束缚中产生的人的解放，即理性的胜利。世界和人的脱咒术化使自律性、创造性的行为主体诞生。个人至上的认识促进了从传统的权威到自由等的科学合理性，从而使反对现有权威和传统的、绝对的个人主体的能动性和自律性得到最大化。随之，理性主体从周边的物理世界和他人的影响力中脱离出来，可以作为“自律性的存在”维持独一无二的正体性。在此，近代最重要的价值，即“个人自由”诞生了。

西方启蒙主义发现的理性个人包括宗教的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解放和自由、自由的经济活动、舆论的自由并且通过确立市民的公共性建设来保障主体的自律性社会。毫无疑问，发现了拥有自由和平等人权的理性个人是历史的进步。西方近代的人类观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观相连接，并由此导出了社会契

约思想、人民主权思想、自治主义思想等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所有要素。社会契约思想是自由并且平等的人类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在相互同意下构成政治社会，自己决定并选择政治秩序和组织，并由此肩负责任的^①政治人权主义。通过这样的社会契约，个人以市民资格与国家建立直接的关系。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应该保障国民的人权。

近代国家是以有效保护国民的权利和财产的国境为单位的。为了建立更加牢固的体制，近代国家有必要以民族为单位形成集团的正体性体制。同样，通过确立内部的体制构成民族就成了建设近代国家有益的基础。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对与西方文明不同且无法统合的他人他国进行了强制性的、统一化的、压迫性的支配，并且使这种支配和统治正当化。他们把对待他人的“帝国主义侵略”视为白人的义务。个人为了排除外部的干涉，要求与其他个人平等的看待，从而保障自我实现的权利。这种个人权利是绝对的。但是，拥有这种绝对权利的西方近代性主体的市民，与非西方的“野蛮”他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却绝对不与他们分享欧洲人的人权。因为他们认为“野蛮人”不过是自己无法享受文明的不完全的、缺乏性的存在。因此，西方近代主体的野蛮行为从世界的层次看是进步的这一评价是片面的。^②

（二）个人概念的吸收和变用

一般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近代主要指的是西方文明。韩国将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典范来接受。但是，韩国不仅仅在历史社会文化上与欧洲不一致，而且因为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故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建立与西方相同的近代。而且由于韩

① 金圣基等著，《现代性是什么》，民印社，1994，57—58页，264—265页。

② 以理性为根据所进行的西方近代文明对非西方地区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导致野蛮压迫的历史可以说是“工具化的理性”。尽管如此，也应以理性为根据囊括全人类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说西方近代文明在进行野蛮的压迫或者以理性为依据的西方文明是近代文明的一个层面的话，也有必要对理性进行反省和省察。

国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文化中心轴心“由神向人”的移动变化，故近代化的形式与西方自然不同。将人与自然、精神和肉体的分化或者从神中建立自由的理性个人的问题反而成了次要的。因为，相比自我发现来讲，通过对抗强大集团主体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韩国的首要任务。

韩国也曾想吸收西方文明所带有的文明性，从而建设像他们一样的文明强国。若确立能够引领近代国家的问题，则需要对性理学进行批判省察，同时也要搞清楚西方近代主体的含义。理性的个人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和根据，所以发现保佑人权的个人对韩国来讲也是同样重要的。但是，文明的主体也是放纵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野蛮主体，因此，将西方社会的个人作为近代主体盲目移植并不容易。而且，西方近代市民的权力是通过政治和法律的自律性而实现的。但是，韩国没有形成市民阶级，并且经受了暴力的殖民地化过程，所以就显示出与西方不同的面貌。面对外敌，国家和民族要比个人更重要。在民权运动展开的独立协会时期，个人和市民也不能作为重要的争点；日俄战争后在激烈的民族谈论中作为民主构成要素的个人的自由和民权问题也无法成为重点。自强运动期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当时的时代是“民族间的竞争时代”，认为“有国才有人民，没有国家就没有人民”。可见这反映了在吸收西方近代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维持体制和独立的“集团觉醒”的一面。

而且当时社会进化论兴盛，自强思想家们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进化论的影响。社会进化论主张适者生存，将强者的行为正当化，并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构成了万能理论。韩国人也想接受他们的文明变成文明强者。但是，批判近代文明野蛮性的标准不能从代表强者的社会进化论和人种主义中推导出来。韩国认识到自己是个弱者，因而努力实现富国强兵、恢复国权，并且要克服将强者的侵略合理化的社会进化论的束缚。

因为性理学作为引导“近代”的新理念没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所以有必要对性理学乃至儒学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省。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儒学的传统都以凝滞的状态残存着，所以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那些把人作为主体、自然作

为客体的两分法和把人的精神和肉体两分法的近代传统是很难的。也不能毫无批判的接受从现有传统和权威的各种关系中向自由理性个人的转化以及对人进行纯生物学的理解。当时作为世界认识准绳的社会进化论其根本是把人看作是生物学存在物。这就存在用生物学的观点解释道德性的先天性问题。所以，对接受了西方文明论调和社会进化论的近代知识分子来说，确立近代主体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复杂的面貌。而且，社会进化论所带有的基本问题是把人看成与其他生物完全一样的生物体，因此不能解释伦理的当为规范。俞吉潐是与排斥西方的卫正斥邪派不同并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代表人物。他也曾指出人伦道德的重要性。长久以来，韩国儒学也是一直处于强调人类道德性的传统之中。因此，自强运动期接受西方的近代性和儒学的近代转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哲学课题。与西方近代的接触中，解决韩国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的近代主体在“韩国式的近代”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申采浩：确立“固有朝鲜”的主体

（一）我和非我的关系

申采浩将西方的普遍和非西方的野蛮以及帝国和殖民地这个鲜明的近代规则通过我与非我的关系来认识。他站在民族主体的立场上理解近代文明，对西方的侵略性进行了辛辣的批判。申采浩思想的核心概念可以说固有朝鲜的主体——我。申采浩将人类历史看作是我和非我的斗争，设定了与他者——“非我”相对抗的主体——“我”。这与如何认识西方这个强大的他者相衔接，同时也提出了如何确立近代国家主体的问题和思路。他对“我”和“非我”的范畴作了如下定义：

所谓的我在主观的位置上来说是善者，而非我是我以外的东西。例如，

朝鲜人把朝鲜称为我而把英国或者美国等称之为非我；而英国美国等却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我，而把朝鲜称之为非我。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称为我，而把地主或者资本家称为非我；而地主和资本家却各自把己方称为我，把无产阶级称为非我。（中略）即不管是什么，如果有一个本位的我，就会有一个对峙的非我存在。^①

拥有本位和固有属性的我通过与非我，即他人结成关系而了解他人的境界和自己的特征。这样的话，我和非我的范围也可以是个人。但是申采浩没有把个人设定成近代主体。因为个人“我”的意识比较微弱，范围比较弱小缺少相续性和连续性。集团和社会也是相同的。因为当时他处在国家和民族竞争的时代，所以把朝鲜民族设定为我。朝鲜民族固有的主体——我通过相续性和普遍性^②的历史行动将自己的属性维持了下来。

在近代的空间中我（固有朝鲜^③的近代主体）和非我（强权帝国主义^④他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针锋相对的存在。所以我固有的思考和社会行动方式不仅在我的垄断性中孕育，而且在我与非我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申采浩将我和非我的关系用“先天的实质”和“后天的形式”来说明。

从先天的实质来说，我产生之后才会产生非我。但用后天形式来说，则先有非我后有我。具体来说，先出现朝鲜民族（即我）以后才有了与朝鲜民

①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上，《朝鲜上古史》，31页。

② 相续性指的是从时间上看生命是连续的，普遍性指的是从空间上看影响力是波及的。参见上书，32页。

③ 此处的朝鲜指的不是李成桂建立的朝鲜王朝，而是自从檀君朝鲜以来延续了历代王朝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朝鲜。参见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上，《朝鲜上古文化史》，359—369页。他在《读史新论》中也使用了“东国民族，檀君后裔”之名称。

④ 申采浩将近代朝鲜强有力的他者——帝国主义定义为“扩张领土和国权者”。同时也指出，西方列强崇拜这种帝国主义，由此展开了对亚洲和非洲的侵略。这种帝国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开拓的必要性而产生的，它高举着弱肉强食的原理和军国主义的旗帜而肆意横行。参见《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二十世纪新民国》，219—221页。

族相对的苗族和支那族等非我，这是属于先天性的。但是，若没有苗族、支那族等（非我）的相对者，则朝鲜就不会有树立国名、设立三京、五军等（我）的作用，这属于后天性的。^①

从伦理的因素来说，先有先天的实质后才有后天的形式。因此，先天的实质本来就具有我所固有的特征，与后天的形式相比较是根本的。但是本来所具有的我的特征并不是在孤立的状况下维持的。我和非我的关系既是相互排斥的，同时又相互依存。没有非我，主体我的自觉就无法作用。我本来具有的先天性实质是在与非我的关系中才会变成可能，排斥性的我的作用也是在与非我的相遇中后天形成的。因此，在我和非我的关系中为了不丧失主体性，维持一定的形式就需要确立主体的精神，但是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后天的形式也是很重要的。申采浩认为通过我和非我不间断的关系作用，先天的实质和后天的形式都会得到发展。

（主体的）精神的确立护卫了先天的东西，通过顺应环境的过程后天的东西得以维持。如果两个中有一个欠缺，都会招来败亡。^②

先天的实质（确立主体的精神）和后天的形式（对环境的顺应）是维持我的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维持我的主体性，不仅要有对先天实质的自觉认识，还需要有对非我的明确认识和正确的对应。但是，当时正值丧权亡国的关头，不可能形成与他者建立关系的现实基础。所以以不丧失主体的精神来争取不丧失先天的实质就成为了建设民族国家形式的基础。作为先天实质的国粹论就是申采浩提出的建设民族国家基础的一条道路。

（二）先天的实质：国粹论

^①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上，《朝鲜上古史》，32页。

^②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上，《朝鲜上古史》，32—33页。

面对着强大的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申采浩主张在固有朝鲜的基础上建设主体性文明和独立的近代国家。但是，在建设近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都丧失的现实中，申采浩提出了国粹论。他把国家看作带有民族精神的有机体。而且国家^①是在有国家精神之后才有国家形式^②，国家精神是国家形式之母。他这样重视精神的历史不仅仅是因为只有维持了我的先天性实质才能不丧失主体性，而且还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够打开即将丧失国家形式危机的局面。他认为要认识我的先天性实质，就需要认识朝鲜民族的属性，要认识朝鲜民族的属性最重要的是认识我的成长发展过程以及把握与我所面对的四邻各族的关系。^③他认为无精神的历史会产生无精神的民族和无精神的国家，因而强调精神的历史。^④他认为形成精神上国家的要素--国粹很重要，不知道国粹就无法实践真正的爱国。

国家也有美，在本国所具有的风俗、语言、习惯、宗教、政治、风土、气候中选出其美丽称之为国粹。即，国粹是国家的美丽，不知道这种美丽而妄提爱国，则是虚假的爱国。^⑤

申采浩也把国家的美即国粹表现为国民之魂。他认为作为朝鲜人没有主体性的自豪感和精神的话就最终无法建设民族国家，因此强调保存国粹。

（三）“固有朝鲜”的近代主体：新国民

申采浩面对着西方文明成为世界中心文明的现实，认为如果朝鲜人丧失实质

①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上，《读史新编》，471页。

② 申采浩把国家分为精神上的国家（抽象国家）和形式上的国家（具体国家）。精神上的国家意味着民族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生存精神、发扬国威的精神、发扬国光的精神等；形式上的国家意味着国土、主权、大炮、陆军、海军等集合体。参见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精神上的国家》，160页。

③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上，《朝鲜上古史》，33页。

④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上，《读史新论》，472页。

⑤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国粹保存论》，116页。

先天的话就会连后天的形式也不能坚持，最终成为西方的奴隶。他通过保存国粹确立主体性的哲学基础，犀利地批判了非主体性的世界认识和盲目的文明化。^①他虽然主张文明化，但也认为如果盲目追求西方和日本也就不可能与外国文明决一胜负。因此他主张不要盲目的与外国文明对决，而应该吸收他们的思想和文化，并在不丧失朝鲜固有性的同时实现文明化。^②他不是丢掉对民族和传统的主体性完全接受西方的思想和制度，而是希望在民族主体性和精神的大我^③的基础上高扬爱国心，发展教育和产业。因此他扩大了真正的“我”的概念^④，强烈主张摈弃小我，发展大我。^⑤

小我是肉体的、物质的，不是真我；大我是不死的、精神的，是永生勿死的我。我们的民族应该扩充我的概念。^⑥

申采浩扩大精神的大我之目的是以此为基础恢复国权，建设与他者不同的固有朝鲜的近代国家。申采浩将固有朝鲜的近代主体表现为新国民。新国民是引领近代历史的近代主体，是固有朝鲜的新主体。固有朝鲜的新国民是日新的新国民，不是谁来制造的，而是靠国民自己的觉悟而达到的主体的、自律的存在。^⑦

申采浩在确立作为近代主体的 20 世纪新国民中非常强调作为儒教本质的新道

① 申采浩不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亚洲共荣和东洋主义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对外交论和准备论的虚构性也进行明确的指责。这种批判精神的根源恰恰是“固有朝鲜”的主体意识。但是固有朝鲜的主体性通过与日益现传的他者所缔结的关系可以存立，所以对他者的认识问题也变得非常重要。申采浩即对野蛮的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抵抗，也提出了通过“民众联合”来建立我和非我的新关系。但是，本论文内容限定在自强期之内，所以对这一部分不做论述。

②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下，《旧书刊行论》，99—104 页。

③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大我和小我》，101 页。

④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大我和小我》，101 页。

⑤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大我和小我》，101 页及别集，《扩充‘我’的观念》，157 页：“小我是肉体的、物质的，不是真我；大我是不死的精神的，是永生勿死的我。我们的民族应该扩充我的概念。”

⑥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扩大“我”的观念》，157 页。

⑦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20 世纪新国民》，211 页。

德。申采浩非常肯定儒教的扩充论述，^①认为儒教对社会有着全面的影响，可以立足儒学的根本真理创造文明的风潮。

数百年来，韩国儒教的实力蓬勃发展，人情也有很多儒教，风俗也有很多儒教，习惯也有很多儒教。这个教成为了唯一的国教，现在如果真正扩充儒教并欢迎文明新风，定能大大增强国民的幸福。^②

申采浩称韩国是儒教国家的意义是什么？他最强调朝鲜固有的先天实质，先天的实质意味着朝鲜固有的精神，认为固有的朝鲜适应环境的同时重新发展。即，我在先天的实质与他者建立关系的同时变化发展。那么作为儒教国家的韩国在当时强力的他者——西方文化的外压中，为了保持固有朝鲜的主体性扩大儒教的本质是必需的，积极发展朝鲜国粹的道路。在发展国粹的要素历史和政治中儒教一直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通过对儒教的改革扩大朝鲜精神的主体性可以发展成为新的文明。但是，韩国作为儒教国家，儒教占据了国粹的绝大部分，所以不是对朝鲜性理学不做任何批判全面接受的。他主张任何思想都是为韩国而存在的，而不是说韩国为思想而存在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所以，他批判朝鲜儒学的事大主义和奴隶性。但是主张应该实现儒教的本旨，并通过他们实现文明的新风尚。

申采浩认为西方国家力量的源泉是道德，因此主张新国民应该脱离前近代的道德而拥有新的道德。他还认为道德不可避免的具有根据时代和场所的不同而变化的相对性，道德与生存和利害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因此他认为用中世纪的精神和物质无法在 20 世纪生存，有必要建立适合当时时代的新道德。他认为新道德应该是以国粹的道德为基础，为国家和民族的福利而存在的。他认为 20 世纪新道德作为国家道德的性质非常强烈。例如他在论述正义心的同时，指责私利心的

① 申采浩在《儒教界的一论》（别集，109—120 页）中对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作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认为朴殷植的主张获得了世人的信任，为儒教界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② 申采浩，《丹斋申采浩全集》下，《论儒教扩张》，119 页。

弊害。即私利心是让国民腐朽、让国家衰败的大原因。韩国人因为私利心小则自己堕落危害县郡，大则会达到卖君卖国的境地。因此主张必须要通革私利之心。认为只有革除这些私利心才能培养为国家献身的公共道德。即，申采浩所提出的新国民是个人自发让步于整体，私立自发让步于公德，强化集团的结合力来克服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生存，民族才会得以保存。

拥有国家精神和国民能力的新国民不是专制民主时代的臣民，而是国民主权时代的国民。他认为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不在于豪杰的个人能力，而是在于国民全体的实力，从英雄中心的历史观中脱离出来，拥有国民中心型的国家意识。他断言一国的兴亡在于国民整体的实力而不在于一两个英雄豪杰。^①而且新国民不分强弱、贫富、职业和地位，在人这一点上其人格和人权是平等的。^②实行这种平等主义的西方一定会兴盛，奉行不平等主义的波兰和印度一定会衰亡，所以国民最大的不幸就是不平等。因此，民族间、国民间和庶嫡间的阶级主义会招来亡国灭民，是必须要去除并实现保障新国民人格平等的国民主权体制。

四、朴殷植：真我的近代实现

（一）关系性中体现的良知

在西势东渐的近代化进程中，儒教的普遍主义被西方的科学文明所排挤，而处于此段激变时期的思想还没有确立。面对这一时代背景，朴殷植试图通过阳明学中来认识现实，实现自强和独立。他虽然批判朱子学的弊端，但仍坚持儒学式的思维。儒学是以“关系性的人”为前提的，故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无从谈及儒学。儒学要求个人在人际关系网中要根据自己的位置和情况来行动，以“关系的重视”为基础，因此个人在社会中要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这很

① 《丹斋申采浩全集》下，《所怀一幅普告同胞》，94页。

② 《丹斋申采浩全集》别集，《20世纪新国民》，213—214页。

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条目中，比如仁、忠恕、五伦等都是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条目。

比起独立的个体来，朴殷植更加关注重视关系性的“良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近代社会。与重视客观规范的朱子学不同，以道德主体——良知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更加重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性。这种良知学的特征如实地反映在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民族的关系中。朴殷植所说的良知是道德主体，它能对激变的韩国社会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能实践与之相对应的方案。

朴殷植指出，要建设近代国家，固然要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但不要全盘模仿西方社会。如前所述，韩国没有经历“从神向人”的文化轴心的移动过程。而且，西方近代的人（person）和自我（self）的概念将合理主体规定为与他者的对立关系，同时也保证其正统性。近代形成的独特的个人意识的核心也被规定为与周边他人的关系性。中心与周边、主体与他者的二分法是贯穿近代一切领域的逻辑理论。这种二分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将西方理性的个人对他者的侵略即帝国主义的侵略视为文明的恩泽，认为是正确的。韩国的知识人若被这种逻辑所迷惑，就不会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性。朴殷植指出，虽然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文明性，但也要批判他们的野蛮性和侵略性。当时韩国的知识人吸收社会进化论，直面韩国的弱国现实，展开了自强运动。但社会进化论只是将强者的一切行为正当化，并没有提出批判野蛮侵略的道德基准。而且当时的时代还迫切需要道德判断和实践。因为只有克服个人的私欲，国权恢复运动和独立运动才能够取得实效。朴殷植试图通过对良知的近代解释来解决此问题。

（二）韩国的近代式主体：真我

阳明学中的良知是心的本体和是非判断的准则。^① 因此将良知视为人间主体

① 《传习录》下：“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而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

的准则就包含着在判断是非和善恶时相对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之意味。客观的社会规范虽然可以提供评价行为是非的一般准则，但道德行为及其目的动机却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普遍的规范不能包括所有具体的行为，故依据外在的规则和条目无法作道德判断，反而会涉及太多的个人道德情感或信念、良心等。在此层面上看，王阳明所认为的主体依据内在的良知来判断善恶的观点是非常可取的。^① 朴殷植也指出，“人之有良知，如天之有日，而世犹有疑于此，何哉”^②。他如此理解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良知：

（王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如同孟子的性善。看天下之人，虽然是**极**不孝之人，但也知孝的珍贵。虽然是**极**不忠的人，也知忠的珍贵。因为他们的良知本来就是相同的。陷于不孝不忠之恶，只因被欲望所动而掩蔽良知。人的意念发动时，良知就会**判断**善恶。良知是我的**神圣**的主人、公正的监察官。^③

朴殷植将判断善恶的道德主体之良知定义为一身之主。良知是在与事（人间关系）和物（客观世界）结成关系时发见的，并且在君臣、父子等人间关系成立时或认识客观事物时，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做是非判断。因此，与客观化的社会规范相比，阳明学更注重具体的情况，比如事与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现实的关系，并且能够对各种情况作出积极的对应。朴殷植活用了这种良知的特性，试图以之来应对激变的社会现实。他认为不管在平时还是社会的激变期，阳明学都能够提供正确的对策。

先生的**学问**是推本心的良知至于同体万物，**并**视为仁。因此，君臣、父子、朋友、人群关系等都能够**极尽**精诚。故不管是在**没有**变化的日常生活中

① 杨国荣，金炯瓚等译，《阳明学》76页。

② 《朴殷植全书》中，《王阳明实记》，48—49页。

③ 《朴殷植全书》中，《王阳明实记》，59页。

还是在激烈变动的社会情况下，良知都能够神化妙应。（中略）谁认为良知之学不足以达道？^①

朴殷植将良知的特征分为五类来分析，并从中推导出其近代意义。

所谓良知是自然明觉之知，纯一无伪之知，流行不息之知，泛应不滞之知，圣愚无间之知，真是奇妙啊！谁能在这上面再附加别的呢？^②

良知的特性中，自然明觉和纯一无伪指的是良知的一般特性。此处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流行不息和泛应不滞两点。阳明认为在心的不息的流行中有主宰。人心不息的流行，虽然事态变化万千，但只要主宰是安定的，则心就可以泰然自若。

^③ 朴殷植认为良知只有在应对各种不同的变化情况并不失其主宰性时，才能确保善。

主人（良知）的精神清明、根基牢固时，就会公正的判断天下的是非善恶和公私邪正，就不会被利害祸福和死生荣辱所动摇，不会困惑于苦难之中，会在自己所处的条件下完成天下之大业。^④

这就是说，因为良知清明、根基牢固，故以此为基础，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人才不会被外在的各种利欲所迷惑，才会排除万难而急流勇进。朴殷植认为良知只有成为心的主体才能自由自在的应对各种现实问题。他把这种确保良知主宰性的状态称为真我。所有人都存在良知，而为什么有的人不能成为真我呢？他指出，这是因为人的信念埋没于外部事物，从而不能摆脱决定快乐和忧虑的妄幻状态。只有脱离这种妄幻状态才能成为真我。

① 《朴殷植全书》中，《王阳明实记》，63页。

② 《朴殷植全书》中，《王阳明实记》，48—49页。

③ 《传习录》上：“若主宰在之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

④ 《朴殷植全书》下，《告我学生诸君》，49页。

为了成为**真我**，必须以良知的本能作为主宰。要不受复杂变幻的外部事物的引诱和使役，要能够命令和制裁万物。^①

真我不受私欲和物欲的指使，能够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并且能够实施这种判断。人要根据万事之主宰即良知来判断和行动。立心和行事中都有真我的显现。

人的立心和行事只有**从真性**中得出，才能得到上天和神的帮助。用**真性**来行善者就没有荣辱和祸福的观念。若用荣辱和祸福的观念来行善则是伪善。^②

朴殷植认为，荣辱祸福不能成为是非判断的基准，强调要注重良知的判断和实践。他提出要涵养良知，以此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当性，并且以此来确保能够应对激变的历史情况的是非判断能力和实践力。

朴殷植还认为，要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来实现文明化，但同时也批判西方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侵略性。他还提出了解决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现实问题的思想依据，那就是要积极吸收社会进化论和西方的自然科学。同时也要以阳明学为基础，加强与道德相分离的“客观自然”的研究，还要关注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性，要将科学知识的道德性视为问题点，由此可以来批判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和物质文明的弊害。他辛辣的批判科学技术是杀人的武器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一点。他还阐明了东方哲学虽然在研究客观世界方面比西方落后，但它在实践道德性方面是有贡献的。他还展望指出，若是实践儒学的道，则就会实现人道和平。当然，他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体系化的、深层次的来讨论近代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性，但却从逻辑上阐明了面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冲击，儒学能对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培养方面做出贡献。

① 《朴殷植全书》下，199页。同样的内容也可参照《东亚日报》1925年4月6日的社论。

② 《朴殷植全书》中，《梦拜金太祖》，209—210页。

对事实的理解要不受价值判断的干涉，但价值判断本身要在事实理解即对客观情况的知识理解基础上实现。朴殷植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属于前者，即它强调事实理解不受价值判断干涉的一面，并且追求实现这一点；而与之相比，东方学问则属于后者，即价值判断要在对客观情况的认识基础上实现。故为了实践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当为规范，就需要首先正确的理解事实判断，并且还要将以自然的客观理解为首的所有事实理解活用到人生的实践中去。由此可见，朴殷植虽然吸收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分离的近代科学认识，但同时也注重二者的关系性。他将科学知识的道德性视为问题点，并努力实践正确的人生。这一点上可谓意义重大。

（三）真我的近代实现：新国民

良知是虚灵明觉的，故能够分辨是非和善恶；因为是泛应不滞的，故能在任何情况下很畅通的对应万事万物。朴殷植认为，依据良知就不会固执于近代社会固定的纲常，就会正确的认识时代变化，并作出适宜的判断和实践。因此，泛应不滞的良知既能够追求自强，又能够反省作为自强手段而提出的竞争原理，^①而且进一步能够批判当时自强运动的问题点。他借用社会进化论主张说，有亲日行为或追求私欲满足的自强运动者要积极进行自我反省来实现真我。当时一部分社会进化论者主张要承认日本的强权主义，并依靠日本来实现文明化，更有甚者提出要使日本的侵略行为正当化。^② 朴殷植虽然也认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文明开化很

① 参见拙文，《对朴殷植思想转换的考察——从朱子学到阳明学》，载《韩国思想史学》第12辑，1999。

② 朴泳孝指出，英国在文明的名义下对印度展开的侵略是合理化的，不仅如此，为了实现文明的普及，与其是处于野蛮状态的亚洲诸民族通过自立政权来实现，还不如接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来得实惠。尹致昊也主张说，清日战争以后，日本的文明化比清朝的统治更好；俄日战争以后，黄色人种——日本人的文明化比白色人种俄罗斯人的统治更好。参见牛南淑，《朴殷植的自强独立思想——以理论结构为中心》，载《韩国政治学会报》第31辑第2号，81—82页。这虽然是如何看待文明化的内容和基准问题，同时也是知识人对应当时的文明化

重要，但同时又强调指出，如果文明开化不以国家成员的主体自觉和强烈的道德性、能动的实践为基础，就不是真正的开化。

朴殷植所主张的确保良知主宰性的“真我”在近代究竟指的是什么？他认为，在因帝国主义侵略而丧失国权的现实情况下，为了克服危机，所有的国家成员都应该成为新民，这其中，他尤其关注青年。因此，真我的近代实现体是新国民。他指出：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明天，我们唯一所期望的就是教育青年，培养他们成为新国民。^①

新的文明精神不能进入头脑中是因为旧有意识的残存。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成为新国民。^②

他认为，欲成为新国民，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摒弃奴性，同时要积极教育青年使之担负起民族的未来。不摒弃奴性就很难建设新的国家和社会。而且他还严厉指出，当时的朱子学者完全是宋儒的衷心奴仆，墨守陈规，抗拒开化，最终招致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比焚书坑儒的危害更大。^③他认为应该高扬自修自立思想，这样才能守护国权，确保文明的进步性。^④他认为在国权丧失的时代里，教育和殖材（积累财富）是实现良知的方法，庚戌国耻以后追求独立的实践是良知的实现。他如下指出：

看似忠国爱族之人遭遇惨祸而卖国祸族之人享受富乐，实际上这是由于不分天理和人欲的大小、无视灵魂和肉体的轻重而产生的误解。若以荣辱祸

与独立方法的道德性问题。

① 《朴殷植全书》中，《梦拜金太祖》，264页。

② 《朴殷植全书》中，《梦拜金太祖》，295页。

③ 《朴殷植全书》中，《王阳明实记》，51—52页。

④ 《朴殷植全书》下，《社说》，56—57页。

福之观念来行善，则就不是善，而是伪善。用真诚来行善之人反而没有荣辱祸福的思想。^①

他认为，庚戌国耻以后，为了实现民族的目标，国家的独立需要有不计较荣辱祸福的强烈的道德性和实践力。实践良知是对国权丧失和庚戌国耻的民族现实的正确判断和对应，因此要积极成为新国民，建设近代民族国家。

五、结论

通常将近代称为“西势东渐”的时代，这一词语如实地表现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对强有力的他者——西方的时候，我们只会反复发问“我究竟是谁”。可否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考验，另一方面要实践自我防御的本能？我们应该通过自我肯定来实现对他者的积极对应和建设新社会的动力。

面对异质文化的西方近代，朴殷植和申采浩都主张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批判性的继承儒教传统，以此来确立韩国的近代主体地位。西方文化的基础可以说是理性，西方近代的理性是从咒术性、神化性的世界观以及传统与神的束缚中来寻求人类的解放，以理性的胜利为特征。由于中世纪人的理性被赋予了神的地位，所以近代性的核心只能是主体问题。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韩国一方面吸收近代文明的优点，同时又力图通过对儒学的近代化诠释来解决近代问题。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和申采浩都提出了新国民作为国家层面上的对抗主体，而不是注重理性的个人之发现。他们认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是保全个人生存之路，因此对于市民社会的主体一个人没有赋予强有力的意义。他们认为新国民集团的觉醒是恢复国权和实现独立的优先要务。他们所说的新国民不是独立的个

① 《朴殷植全书》中，《梦拜金太祖》，210页。

体，而是国家民族的成员，具有强有力的集团意识，还要实现良知、新道德等道德的觉醒和实践。另外，朴殷植的道德良知以及申采浩的固有朝鲜的主体性都与儒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儒教的近代诠释有一定的关联。朱子学由于没能实现对近代的积极对应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朴申二人并没有将儒学视为应该完全摒弃的对象，而是认为其对新国民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并以此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思想。朴殷植关注良知学以及申采浩肯定儒教扩张论都是从近代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诠释和改革儒教的尝试。他们通过对儒教的批判和继承来确保了朝鲜的主体性，并提出只有不丧失主体性才能够实现主体的文明化和独立。他们既批判儒教又继承儒教的做法并不矛盾，是近代朝鲜主体对应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来实现自我成熟的过程。他们作为国家成员来强调个人的义务或作用，势必会相对忽视个人的人权和市民权。但这不能单纯看作是他们个人的局限性。由于近代韩国处于丧失国权、缺乏法律保护的时代情况下，故他们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个时代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时代，能够建设民族国家的新国民是近代的主体。新国民是包含民族主体性的国粹和国魂的道德主体，也是引导国家走向独立的实践主体。

（作者系韩国 釜山大学 哲学科教授 / 邢丽菊 译）

参考文献

- 《孟子》，《中庸》，《传习录》。
- 《丹斋申采浩全集》，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1987。
- 《朴殷植全书》，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1975。
- 金圣基等，《现代性是什么》，首尔：民印社，1994。
- 朴正心，《对朴殷植思想转换的考察——从朱子学到阳明学》，《韩国思想史学》第12辑，1999。
- 朴正心，《关于申采浩儒教认识的研究——以近代的主体问题为主》，《韩国思想史学》第22辑，2004。

朴正心，《韩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近代意识》，《东洋哲学研究》52辑，2007。

杨国荣，金炯瓚等译，《阳明学》，首尔：艺文书院，1994。

梨花女子大学韩国文化研究院，《近代启蒙时期知识概念的吸收和变化》，首尔：邵明出版，2005。

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编，《西方文化的吸收与近代改革》，首尔：太学社，2004。

A Study on the Subject of Modernization in Korea

Park, Jeoung Sim

The Modern Age is called as the era of Eastern Penetration of the West(西势东渐). This terminology reveals clearly the shocks of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e. When we faced strong others(他者), that is, Western Cultures, we had to asked serious question of "Who am I" to oneself. And when the fact to meet others, that is, Western, accompanied the invasion of the imperialism it is natural the Eastern to have the instinct self-defense.

Shin Chae-ho(申采浩) and Park Eun-sik(朴殷植) which experienced heterogenous others, Modern Western tried to make essential Korean Modern subject through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Western and also critique and accession of the Confucianism. It is natural to call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s rationality, so Modern Western rationality ha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means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mythological view of the world and traditional restriction. In the Middle Ages which human rationality was granted the status of Divinity, the core of the Modernity was the subjectivity. But Korean Modernity which confronted the invasion of imperialism tried to accept advantages of the Western Modernity and also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Eastern modernity which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ity.

Shin Chae-ho and Park Eun-sik presented the identity of New Nationality(新国民) as the national correspondent subject rather than rational identity. The New Nationality which they represented required the moral awakening and practice and also attached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body. And also Natural Moral Knowledge(良知) of Park Eun-

sik and Natural Subjectivity of Joseon(朝鲜)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Confucianism. But they tried to change this Confucianism to contribute to constitute New Nationality. They though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Joseon will be concreted by succession of Confucianism. So the fact that they tried to critique and succeed the Confucianism means the process of self-realization and self-maturity.

Key Words: Modernity, Modern Confucianism, liangzhixue(良知学), Subject, New Nationality(新国民)

